

苏联专家穆欣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技术援助及影响*

李 浩

提 要 新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是在苏联专家的大力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以第二批来华的苏联专家穆欣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其1952年4月至1953年9月在华期间的技术援助工作及贡献:①帮助首都北京建立了城市规划工作的科学观念;②对新中国“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建设方针的研究发挥了重要影响;③对新中国向苏联学习规划理论的思想认识起到了重要统一作用;④帮助拟定出新中国第一版《城市规划设计程序(初稿)》;⑤推动一批既有城市按照社会主义城市原则进行改建规划;⑥引导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工作走上规范化的轨道;⑦对“城市规划”专业术语的定名发挥了重要影响;⑧为八大重点新工业城市的联合选厂和初步规划做出了重要贡献;⑨亲手拟定出杭州和上海的初步规划方案;⑩培养和影响了最早一批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穆欣对中国城市规划的重要影响,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在开创初期的特殊状况,而他较多关注城市规划思想性和理论性的特点,也导致其部分技术援助工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 城市史;城市规划史;苏联规划理论;苏联专家;当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2001014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0)01-0102-09

作者简介

李 浩,博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邹德慈院士工作室主任研究员,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 jianzu50@163.com

Soviet Expert Мухин's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Influence on Urban Planning of China

LI Hao

Abstract: China's urban planning profess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help of Soviet expert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contributions of A.C.Мухин,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ond batch of Soviet experts during his stay in China from April 1952 to September 1953. It is found that A.C.Мухин had 1) helped Beijing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urban planning; 2) influenced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construction policy of "usefulness, economy and attention to aesthetics under possible conditions"; 3)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tradition of learning planning theory from the Soviet Union; 4) helped to draw up China's earliest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rocedures (Draft)"; 5) promoted the adoption of socialist reconstruction planning principles in a number of cities; 6) guided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China to meet established standards; 7) advanced the adoption of urban planning terminology; 8)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joint plant selection and preliminary planning of eight major new industrial cities; 9) proposed the preliminary plans of Hangzhou and Shanghai; and 10) trained and influenc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urban planning workers in China. Мухин'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hina's urban planning reflects the special situation of China's urban planning in its formative years. Hi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urban planning led to the limitations of his efforts.

Keywords: urban history; urban planning history; Soviet planning theory; Soviet experts; contemporary China

新中国城市规划已经走过70年历程。回顾历史,1950年代是城市规划事业得以开创的一个重要的奠基阶段,而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影响要素之一。近年来,城市规划史研究领域已经对这一论题产生关注,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赵晨,等,2013;张松,李文墨,2019),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0年间来华援助城市规划工作的苏联专家共计40多人,先后有4个批次,其中对我国规划事业影响最大的当属第二批来华的穆欣、巴拉金和克拉夫秋克(李浩,2019a)。本文试就苏联专家穆欣技术援助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有关情况进行初步的梳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城市建设思想文献挖掘、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9ZDA01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项目“中国当代城市规划科学史(第二期)”(项目编号:2017-R2-005);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创新基金资助重点项目“城市规划口述历史(第二期)”(项目编号:C-201701)

理,期望引起同行的关注和讨论。

1 穆欣在华工作的时代背景

苏联专家穆欣在华工作的时间为1952年4月—1953年9月,共一年半。这一年半时间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间段:1952年4—12月,这9个月穆欣主要受聘在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3年1—9月,这9个月穆欣转聘在刚成立不久的建筑工程部(以下简称建工部)。

在前一阶段,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尚未启动。就城市规划工作而言,尽管上海和北京等地已成立有都市计划委员会,但国家层面尚未建立专门的规划主管机构,而只是由中财委计划局下属基本建设计划处的城市建设组负责一些政策性问题的引导,各地为数不多的一些城市规划活动也呈现出自发开展并延续近代规划传统的特点。自1952年9月起,新成立的建工部开始筹建城市建设局,穆欣以中财委苏联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城建局筹建期间的一些重要规划活动。

1952年12月,苏联专家穆欣与中

财委计划局的一些同志一道转聘至建工部,城建局的筹建工作加速推进,并于1953年3月正式成立(全称为“城市规划与公用事业建设局”,以下简称城建局,图1),这就是新中国最早的国家规划机构(李浩,2019b)。1953年国家开始“一五”计划,为配合重点工业项目建设而迅速启动一大批重点城市的规划工作,中共中央于1953年7—8月召开的大城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以及1953年9月4日发出的《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是对规划工作启动的极大推动。

可见,苏联专家穆欣在华的一年半时间,是新中国的国家规划机构从无到有、城市规划工作从盲目无序到有组织开展、规划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从极度缺乏到逐步汇集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如果说“一五”时期是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初创时期,那么穆欣在华的一年半时间则是这一初创时期的重要奠基阶段。

2 穆欣的个性特点

苏联专家А·С·穆欣(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Мухин,又译莫欣、莫辛

等),男,1900年出生。他“是登山运动员,苏联卫国战争时曾参加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在前沿阵地的战壕中作过战”、“性格非常顽强”;“在苏联建筑界地位不算高,名望不算大,但是实际工作经验比较丰富”,曾为苏联头号建筑大师А·В·舒舍夫(Алекс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Шусев,苏联功勋大师,莫斯科红场上列宁墓的设计人)担任助手,合作过苏联南部城市索契的规划设计,因而给中国带来的也是当时苏联最有代表性的规划思想和方法^①。

在新中国“一五”计划酝酿启动、城市规划事业初创奠基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在华援助城市规划工作的苏联专家,却几乎只有穆欣(图2)一人而已^②。这一点,与1949年首批来华的苏联市政专家团以及1955年以后来华的几批苏联专家组相比,是十分特殊的。

穆欣的特殊性还在于他本人的性格特点及工作作风。穆欣擅长于讲授城市规划的思想性和规划理论,工作中经常追问规划人员其设计作品究竟要表现何种规划思想。就工作方法而言,他非常注意抓核心领导:“穆欣讲得很清楚:我做报告,你把市委书记请来。他就是要积极宣传城市规划是怎么回事”(赵瑾,2017)。另外,作为一名外国专家,穆欣“非常忠实于工作,把中国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③。

穆欣比较注重城市规划的思想性、理论性的特点及其独特的工作魄力,恰好适应了当时的规划工作形势——在规划事业初创的奠基阶段,首先需要解决的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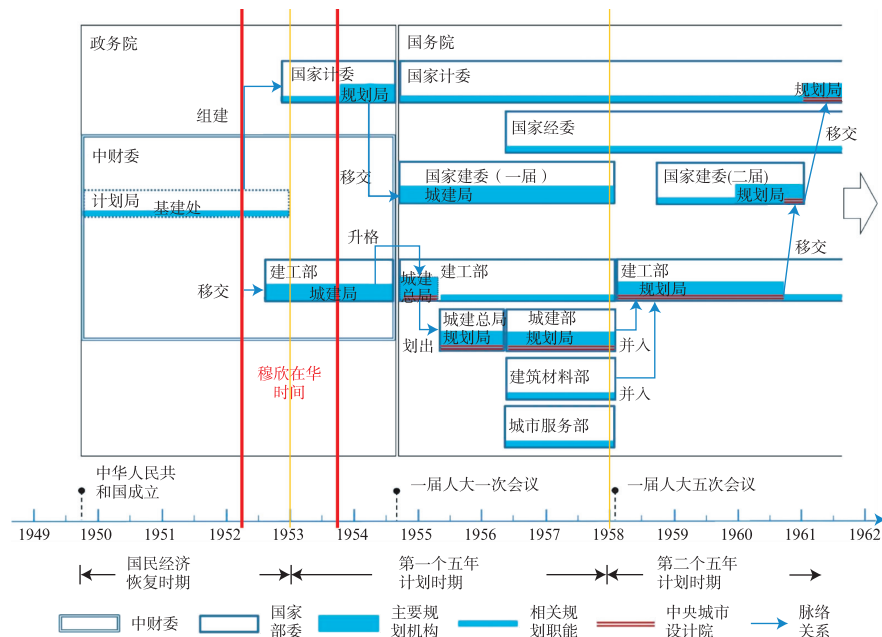


图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规划机构演变及苏联专家穆欣在华工作时间示意图

Fig.1 Evolution of national planning institutions and Muxin's work period in the early days of P.R. China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苏联专家穆欣与中国专家刘敦桢的合影

Fig.2 Photo of Soviet expert Muxin and Chinese expert Liu Dunzhen

左起:穆欣、翻译(女,人名不详)、刘敦桢,拍摄时间不详,笔者据相关史料推测应在1959年初刘叙杰提供。

资料来源:刘敦桢,2007。

疑正是思想认识等最基本的观念问题。

3 穆欣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技术援助及贡献

在短暂的一年半时间内,苏联专家穆欣对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进行了大力的援助,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下大致按时间顺序作简要的概述。

3.1 帮助首都北京建立了城市规划工作的科学观念

1952年4—6月,初到中国的穆欣曾多次对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发表意见,其中既有对城市总体规划工作的指导,也有对阜成门外关厢地区(即西郊行政中心)等重点地区的规划设计发表意见。以1952年6月13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为例,在会议主持人梁思成(时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介绍了北京市规划总图之后,穆欣发言指出:“现在摆的这张草图的制定是否有铁路专家参加?还是仅仅是建筑师设计的?”、“都委会在计划总图时,有没有经济方面的专家?还是仅有建筑师?”、“都委会本身的组织是否还有缺点?如果没有经济学家参加,什么计划都是做不出来的”(北京都委会,1952)。

对于穆欣的作用,北京都委会在1952年度工作总结中概括为3个方面:“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第一、我们明确了规划工作的思想性——规划要有一定政治思想内容……第二、我们懂得了规划与计划的联系,并懂得了规划工作的程序与步骤。第三、领会了过去着重拨地、逃避规划,这种舍本逐末的错误。明确了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才把工作逐渐的推动起来”(北京都委会,1953)。1952年12月,梁思成(图3)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近5 000字的长文,对穆欣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梁思成,1952)。

3.2 对新中国“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建设方针的研究发挥了重要影响

1952年7月2—16日,中财委组织



图3 梁思成等与苏联专家穆欣在一起的留影(1958年于莫斯科)

Fig.3 Photos of Liang Sicheng and Мухин (Moscow, 1958)

左起:梁思成、汪季琦、穆欣、王文克
资料来源:杨永生,2000.

召开第一次全国建筑工程会议,为建工部的成立进行前期准备。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新中国的建设方针(又称建筑方针、设计方针)进行研究和讨论,与会人士大多对朱德老总提出的“适用、坚固、经济”六字方针表示赞同,也有个别技术人员提出应考虑“美观”问题,建议提出“适用、坚固、美观”的方针。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时,会议组织者特别邀请苏联专家穆欣到会指导。穆欣在听取两方面的意见时,对提出“美观”问题的技术人员给予支持,最后总结指出:“在苏联现在的情况下,坚固就不提了,因为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不会)把房子盖塌了,(坚固)不应该成为问题了,但经济是应该注意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考虑经济问题,因此,苏联是‘适用、经济、美观’”^④。

这次会议结束后,建工部(当时尚处筹建之中)党组于1952年8月向中央呈报《第一次全国建筑工程会议总结报告》,其中对建设方针的表述吸纳了穆欣的观点(建筑工程部党组,1952)。后来,中央最终确定的提法是“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1955年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一次报告中曾对这一方针作出了权威的解说(李浩,2019c)。

3.3 对新中国向苏联学习规划理论的思想认识起到了重要统一作用

早在1949—1951年,新中国已经开始倡导向苏联学习城市规划经验,但有关方面的思想认识并不统一,“梁陈方

案”即为一代表性事件。1952年9月1—9日,建工部以中财委名义,组织各行政大区财委有关同志召开首次全国城市建设座谈会,对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及各项方针政策进行酝酿与讨论。苏联专家穆欣于9月6日作重要报告,全面介绍了苏联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城市规划管理和城市总建筑师等重要规划制度,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详细解答了中国同志感到疑惑的一些问题。

这次座谈会后,建工部党组于1952年10月6日向中财委和中央呈报《关于城市建设座谈会的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旧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要向苏联“一边倒”,积极学习苏联的城市规划经验;中财委党组和中共中央于该月先后批复同意了这一报告(李浩,2018a)。对于这次城建座谈会而言,苏联专家穆欣起到了重要的技术顾问的作用,增进了与会人员对苏联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经验的深入理解,有力促进了对城市规划工作及苏联规划经验的思想认识的统一(李浩,2018b)。

3.4 帮助拟定出新中国第一版《城市规划设计程序(初稿)》

为了指导各地即将大规模开展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以及进行规划审查、审批工作的需要,苏联专家穆欣于1952年8月帮助我国拟定出《城市规划设计程序试行办法(草案)》(图4),后改名为《城市规划设计程序(初稿)》(图5),并于1952年9月初在首次全国城市建设座谈会上进行了讨论。

《城市规划设计程序(初稿)》共约7 000字,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工作的目的和要求”、“调查勘察测量工作”、“城市规划设计的三个阶段”、“城市总体规划设计的内容”、“总体设计未做出前的初步规划工作”和“规划设计的审核及批准程序”等6章内容。该文件将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划分为城市总体设计、详细规划和修建设计共三个阶段,明确提出了各阶段规划设计工作的技术要求(中财委,1952),这就为各地区有关城市的规划活动的开展提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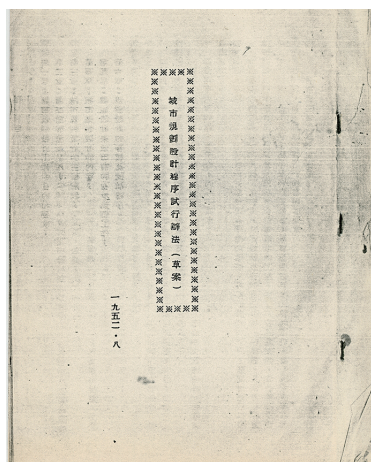


图4 1952年8月提出的《城市规划设计程序试行办法(草案)》(首页)

Fig.4 "Provisional measures for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rocedures(draft)" proposed in August 1952 (first page)
资料来源:赵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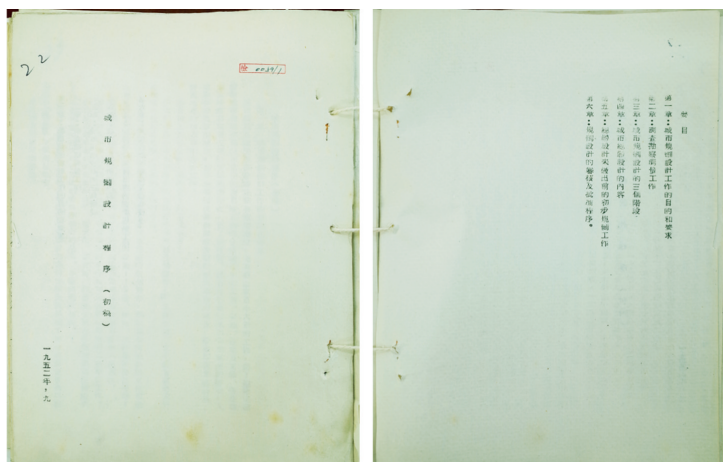


图5 1952年9月讨论的《城市规划设计程序(初稿)》(左为封面,右为目录)

Fig.5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rocedure (1st draft)" discussed in September 1952 (cover on the left and contents on the right)
资料来源:中财委,1952。

基本的遵循,使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在全面启动之初即得到相对有效的规范。

正是在这一文件的基础上,经过后续规划设计实践与经验总结,1954年6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进一步制定出《城市规划编制程序试行办法(草案)》和《城市规划批准程序试行办法(草案)》;到1956年7月,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李浩,2019c)。

3.5 推动一批既有城市按照社会主义城市原则进行改建规划

首次城建座谈会结束后,苏联专家穆欣于1952年10—11月在中财委及建工部城建局(筹建中)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先后到了天津、沈阳、鞍山、哈尔滨等城市”实地调研,“并听(取)了太原和齐齐哈尔的(规划工作)汇报”(孙敬文,贾震,1953)。在所调研的城市,穆欣都发表了长篇的讲话,一方面介绍苏联城市规划经验,另一方面特别强调了城市规划工作的重要性,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发表咨询性意见,这对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城市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提高对城市规划工作的认识,起到了思想动员的作用。

穆欣此次调研对象大多为近代化基

础条件相对较好的既有城市,如何按照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城市的要求进行改建规划,是其深入阐述的一项中心内容。以1952年11月在鞍山的报告为例,穆欣指出“北京是十五世纪初封建时代的极盛时期修建的城市”,“它表现了中国帝王的威风”,主要“是为封建社会服务”;“天津是二十世纪初期形成的,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特别带有殖民地的色彩,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殖民者如何掠夺中国人民”。针对鞍山,穆欣指出它“是最近几十年形成的资本主义之城市,是日本资本家修建的城市”,鞍山市城市规划工作的任务“应该是在计划区(期)内(二十—二十五年)把鞍山改变为社会主义城市”,“城市的修建要使其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规划措施突出体现在:合理进行用地分区,为工人的劳动与生活创造良好条件;重视市中心、区中心和重要工厂厂前区的规划设计,既为人民群众的社会活动创造条件,也强化城市空间结构的艺术布局(城建局,1952)。穆欣的讲话,对各城市的改建规划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3.6 引导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工作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1952年12月初,我国城市规划主管工作中从财委计划局转移到建工部城

建局(当时仍处筹建中),苏联专家穆欣也转聘至建工部。在1952年12月—1953年2月初的这段时间内,穆欣和城建局的同志一起听取了北京、西安、上海、包头、郑州、石家庄等城市的规划汇报,研究了天津、西安、沈阳、兰州、鞍山、石家庄、富拉尔基、郑州等城市的初步规划方案。这段时间是建工部城建局正式成立前的一个关键阶段。史料表明,对于建工部城建局的工作,苏联专家穆欣曾在1953年1月提出过一个组织条例;对于有关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机构的组织与分工问题,穆欣也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并向中国提出过一些建议(李浩,2019c)。除此之外,穆欣对规划设计工作如何进行技术规范也发挥了重要影响。

就当时的规划设计工作而言,赴京汇报规划工作的一些城市,大多携带的是其第一稿规划设计方案,它们在内容表达及技术处理等方面存在着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穆欣听取规划工作汇报的过程中,在对规划设计方案发表意见的同时,对规划设计成果(特别是最为关键的现状图和规划图)的表现方式等,明确提出了一些要求。以兰州为例,由任震英主持的规划工作组所绘制的现状图,地形图是蓝色的,黄河被画成了银色,非常漂亮,但穆欣却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他认为城市规划的艺术性

主要体现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而不在于规划图纸表现的艳丽；为此，穆欣指示建工部城建局的同志协助制定了一份城市规划图例，作为规划设计工作的一个技术规范，同时也是规划审查时的参考文件（陶宗震，2008）。正是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中国规划工作者后来又推出了较为正式的《城市规划参考图例》一书（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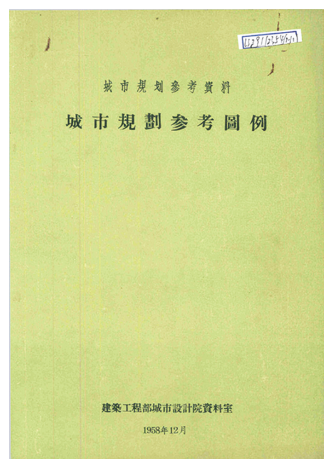


图6 《城市规划参考图例》的封面
(1958年12月)

Fig.6 Cover of "Reference of urban planning legends" (December 1958)

资料来源：建筑工程部城市设计院资料室，1958。

3.7 对“城市规划”专业术语的定名发挥了重要影响

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是借鉴苏联经验而建立起来的，它与中国古代“规画”及近代“都市计划（都市計畫）”传统存在显著的差异，尤其是与国民经济的紧密关系——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穆欣在介绍苏联规划经验及指导具体规划工作的过程中，必然要对规划工作的实际内涵进行详细而准确的解释和说明，由此涉及专业术语的定名问题。

1952年9月6日，在首次城建座谈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穆欣曾指出：“城市计划与规划的区别：用俄文说没有城市计划，只有城市经济计划。它定出城市发展的各种控制数字，计划草案及长期发展计划。城市规划为实际工作，是总图设计工作。计划工作者是经济学家，规划工作是建筑师、工程师”。同

年11月初在天津指导城市规划建设工作时，穆欣也曾谈到：“规划与计划问题：有共同之点，其结果都是计划。在俄文字是一个。但又不完全相同。计划是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是用表格表示出来；规划是根据国民经济计划，在城市的具体布置；国民经济计划是第一阶段的，规划是第二阶段的；国民经济计划是短期的，一年、五年，城市规划是百年大计。规划有三点要求：适用、经济、美观”（李浩，2019b）。

研究表明，采用“城市规划”这一术语名称，大致是1952年9—12月由苏联专家穆欣作技术讲解，刘达容等翻译人员配合协助，当时负责建工部城建局筹建工作的贾震等领导做出主要决策，于1953年3月建工部城建局正式成立之前最终尘埃落定。

3.8 为八大重点新工业城市的联合选厂和初步规划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3月初，建工部城建局宣告成立。城建局正式成立后，苏联专家穆欣与孙敬文局长在万列风、周干峙、何瑞华、赵瑾等规划人员的陪同下，赴西安、兰州和包头等地，参与重点工业项目的联合选厂，并指导各个城市的规划工作，同行的还有其他一些部委的重要领导和苏联专家等。

每到一城市，穆欣都发表了长篇的报告，它们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报告是针对市委书记、市长及各部门领导干部所讲，偏重于城市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譬如穆欣于1953年4月21日在西安市人民政府所作报告，出席人员为“西安市府、西安市委、西北财委、西北建筑局等各单位领导及负责同志”；另一种报告是针对城市规划设计的技术人员所讲，譬如1953年3月20日的一次讲话，内容包括“城市规划经济方针”“现状图”“总平面草图”“城市艺术结构”等4个方面，均为规划设计的技术问题。1953年3—7月期间，穆欣除了赴西北和华北实地调研之外，还在北京多次听取西安、兰州、成都和包头等市规划设计小组的规划工作汇报，对八大重点城市的厂址确定及初步规划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浩，2019c）。

值得注意的是，穆欣在西北和华北之行的过程中，还亲自画过一些规划草图。据1953年8月11日《关于包头市城市建设的问题》的报告，“穆欣同志这次在包头（七月）作了一个初步规划草图（穆欣同志再三讲过，这个图不能往外拿，只供他本人参考）”（华北财委城建处，1953），由此，也表现出穆欣对技术援助工作较为谨慎的一面。

3.9 亲手拟定出杭州和上海的初步规划方案

1953年8月和9月是苏联专家穆欣在华工作的最后两个月，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杭州和上海这两个重要城市的规划工作上。由建工部城建局贾震副局长带队，几位技术人员组成规划工作组，穆欣亲自动手，研究并拟定出两个城市的初步规划方案，各历时约1个月之久。

1953年9月1日和2日，穆欣在杭州发表了长篇演讲（记录稿共1.5万字），详细介绍杭州市初步规划的方案（图7）及有关建议，并于次日（9月3日）转去上海。1953年9月25日，穆欣又在上海发表了长篇演讲（记录稿共2万字），详细介绍了上海市初步规划的方案（图8）及有关建议。在上海时，“穆欣指导完成的规划工作成果，除了‘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和说明报告一份（讲演稿），还有一张‘上海市中心中轴线人民广场至静安寺的规划示意图’，以及‘几个1:2500比例的分中心的规划’”（柴锡贤，2017）。

穆欣在杭州和上海亲自动手提出的规划方案，一度在两个城市引起了较大反响。以上海为例，穆欣在演讲中提出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建规划，主张“彻底的革命的方法，也就是保留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城市基础，但要加以彻底地整顿，加以重新规划的办法”（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1953），吸引了很多听众的关注，同时，也有一些领导和专家对规划方案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柴锡贤，2017）。上海之行结束后，穆欣于1953年国庆节前后完成技术援助任务并返回苏联。



图7 杭州市初步规划示意图(苏联专家穆欣方案, 1953年)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Hangzhou preliminary plan (Muxin plan, 1953)

资料来源: 杭州市建设局, 1953.



图8 上海市总体规划示意图(苏联专家穆欣方案, 1953年)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Shanghai general plan (Muxin plan, 1953)

资料来源: 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 1953.



图9 穆欣1953年回苏前留给中国的“上海旧租界地形图(1855年)”(上)及图纸背后的信息(下)

Fig.9 "Topographic map of Shanghai old concession (1855)" left by Muxin before returning to Soviet Union in 1953 (I) and the information behind the drawing (II)

资料来源: F·B·尤埃尔, 1855.

3.10 培养和影响了最早一批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

以上是对穆欣在华工作的简要梳理。除此之外, 穆欣的技术援助工作还有另一项重要贡献, 这就是对规划人员潜移默化的影响。“穆欣在工作中经常讲课……他注意培养干部”(万列风, 2017)。

穆欣对城市规划工作的讲解、指导及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吸引了一批由相关专业毕业的技术人员, 对城市规划工作产生极大兴趣并从此走了规划工作的道路。周干峙曾回忆:“我大学里不是学规划的, 学的是建筑专业”, “穆欣一来, 他当时就强调了规划, 要做规划”, “是这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成立了规划机构, 能够转行的就转到这个行业上来”(李浩, 2015)。赵瑾指出:“穆欣对我们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启蒙的作用”, “我不是科班出身, 但我是行伍出身, 在实践中, 在专家的指导下去学习”(赵瑾, 2017)。

正是由于穆欣的上述突出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活动中, 苏联专家穆欣的有关言论还表现出相当突出的权威性。以1953年7月召开的全国各大城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为例, 题为

《关于城市规划问题》的简报中针对“城墙拆不拆的问题”曾指出:“北京、西安均为封建王朝的‘历代帝王都’, 有着高而厚的城墙, 对城市交通妨碍很大, 且割裂了城市的统一性, 须要拆毁。但有一些人对此‘历史遗迹’深为留恋, 反对拆城; 苏联专家穆欣亦以为西安城墙比北京还雄伟, 主张保留, 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要拆。因此, 拟再等待一下, 如对目前建设影响不大, 暂时可不拆”(会议秘书处, 1953)。由此可见, 穆欣关于城墙存废问题的意见, 对当时一些高层领导的思想认识和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值得一提的还有穆欣对中国的深厚感情。1953年9月底回苏前, 穆欣曾将其携带来华的一些规划技术资料留给了中国同志(图9)。回到苏联后, 穆欣多次给中国规划工作者邮寄苏联的规划著作和贺卡等(图10), 长期保持着与中国同志的友谊。

4 几点思考与讨论

4.1 穆欣“院士”之说及其背景情况

谈及苏联专家穆欣, 在不少文献, 特别是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者如柴锡贤、周干峙和陶宗震等的回忆中, 还经

常提到穆欣作为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身份。但是, 当我们在网络上查阅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的有关信息时, 却对穆欣的院士身份产生了疑问——尽管网络上有一个与“A.C. Мухин”接近的院士(Мусин, Валерий Абрамович)^⑤, 但其父姓与穆欣却并不吻合, 精通俄文的李文墨博士^⑥同样有此疑问。进一步探究, 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12月梁思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思想》, 文中对于他所接触的两苏联专家, 曾特别指出其中一位专家(阿谢普可夫)的院士身份, 关于穆欣则只是谈到“都市计划专家穆欣同志”^⑦, 该文发表时穆欣还在中国并时常与梁接触, 如果他也是院士的话, 想必梁文绝不会有此疏漏的。据此, 可以基本断定, 穆欣的院士身份只是中国同志的一些誉加之词和误传而已。

据李文墨的研究, 网上很难找到穆欣的有关信息, 目前查得的线索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俄罗斯某建筑师网站上的一段介绍, 内容极其简略: “穆欣·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Мухин Александр



图10 穆欣赠给中国同志的俄文版新书(左,扉页)及贺卡(右)

Fig.10 New Russian book (left, title page) and greeting card (right) presented by Мухин to Chinese comrades
注:左图新书的书名为《Москва: планировка и застройка города: 1945—1957》(1945—1957年间莫斯科的城市规划与建筑),该书于1958年9月17日出版,穆欣签名落款时间为1959年2月7日。

资料来源:吕林提供(陶宗震收藏)。

Сергеевич)(1900—1982),苏联建筑师(Советский архитектор)、建筑结构师,1925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Московское Высшее Техн-ическое Училище)”;另一条是俄罗斯西北部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Мурманск)历任总建筑师的名单,其中有穆欣的名字,服役时间是1949—1952年^⑨,由此,穆欣很可能是在担任摩尔曼斯克市总建筑师期间接到赴华开展技术援助工作的调令,并于1952年3月底离苏赴华、4月起开始在华工作的。

穆欣,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城市规划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享有崇高的声誉,乃至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式人物,但在他的自己的国度,却只是较为普通的一位专家,甚至到今天已经有些不为人知。这样一种巨大的反差,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那么,在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缘何会出现“穆欣现象”呢?

4.2 穆欣对中国城市规划产生重要影响之原因解析

对上述疑惑的解答,仍然要回归到当年的时代背景。首先,穆欣来华之初,新中国对苏联城市规划理论的学习和引介刚刚起步,各部门、各地区、各领域的人士,乃至拥有一定城市规划

资历的专家学者,对于苏联规划理论都还处于一知半解甚至懵懵懂懂的状态,在此条件下,苏联专家所作的一些介绍和讲解,必然会令人感到新奇而独特。

其次,在1952年初的时候,中国刚刚经历了一场由于特殊政治环境和朝鲜战争等特殊因素而引发的批判旧知识分子亲美、恐美、崇美等的思想改造运动(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于1951年底前后集中刊发的大量检讨文章为标志),这就导致了,虽然中国近代也有一批从事过城市规划实践的精英式人物,但他们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却处于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的特殊境地,因故未能成为城市规划工作的主导力量。换言之,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一个规划技术力量“真空”的假象。

再者,苏联专家穆欣先后受聘的两个部门——中财委和建筑工程部,在早年都是极具权威的中枢机构(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都是后续才成立的),所在单位的权威赋予了苏联专家以极大的权威,而当时在华对城市规划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只有穆欣一人,这种权威就又集中到穆欣一人身上,而更加显赫。

另外,在穆欣来华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一级的规划机构一直处于筹建过程中,规划人员稀缺,而新调入的一些技术人员大多是刚从其他专业毕

业的青年学生,大家对城市规划工作一无所知,更奢谈对苏联城市规划的理论与方法有所了解——亦即第一代规划工作者常讲的当时规划工作中所呈现出的“苏联专家+儿童团”的人员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层面城市规划工作的有效开展,对苏联专家穆欣有着特殊的依赖性。

如果能够对上述时代背景有所了解的话,“穆欣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通过对这一现象及其背后诱导机制的分析,也从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于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起步之初的特殊情形及复杂状况,获得了一种更加鲜活的理解。

4.3 穆欣的局限性

对于苏联专家穆欣在华的技术援助工作,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呢?正如上文所讨论的,1952—1953年是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初创的一个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最需要的是城市规划指导思想及理论方法等一些宏观原则的明确,而穆欣正是一个偏重于规划的思想性和理论性的专家,他对中国城市规划技术援助的工作范畴也大多集中在城市规划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层面,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合拍的节奏。也正因如此,穆欣的大部分技术援助工作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穆欣同样如此。对于穆欣技术援助工作的缺点或不足,我们也不必讳言,回顾历史,这主要集中在穆欣对于一些具体的城市规划工作所提出的设计方案或建议上。以上文谈及的上海规划为例,穆欣主张采取彻底的、革命的规划方法而提出的规划方案,在后续实施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当上海各方面的意见争执不下时,城市建设部部长万里不得已于1956年6月专门到上海调研并作了重要报告,明确提出“上海市提出改造上海旧的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城市为社会主义城市,不能采取改良主义办法,必须采用彻底的革命手段,这样提法是不妥当的”,反而主张“在承认过去不合理的现状下,逐步加以改造”的规划模式(万里,1956),这显然是对1953年穆欣规划方

案的一种思想纠偏。

董鉴泓先生认为,穆欣为上海所作的规划方案中,城市中心摆在人民公园、以福州路为中轴线且面向大海等,基本上是古典形式主义的一些手法,并不一定适合于上海这样的城市;而穆欣在参观曹杨新村后所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也表现出他过于强调苏联周边式街坊布局的某种偏见^⑩。

再以文教区规划问题为例,在对多个城市的技术援助工作中,穆欣一贯主张在城市规划中要设置专门的文教区,这显然是他偏重城市规划的理论性、并以此来体现城市功能分区等规划思想的学术性格使然,但穆欣的后继者——苏联专家巴拉金却并不赞同设立文教区的主张(李浩,2016)。在“一五”中后期的规划工作中,巴拉金的观点得到了中国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1957年1月时《人民日报》还曾刊发《谈城市建设中的“文教区”》(方玄初,等,1957)等文章予以明确强调。

了解穆欣的局限性,有助于我们对苏联专家的技术援助工作采取一种更加客观和审慎的认知态度。而对于穆欣的局限性,还有另外一点有趣的解读。在穆欣1953年9月底结束在华工作之前,他的接替者苏联专家巴拉金已于1953年5月底来到中国。巴拉金来华之前曾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城市设计院工作并担任总工程师,他较多从事规划实务工作的经历,使得其在华技术援助活动呈现出与穆欣截然不同的一些风格特点,特别是对城市规划的现实性有更多的关注。因此,原本由于穆欣个人的一些局限性所可能带给中国城市规划的一些不利因素或负面影响,在经历了时间的推移之后,转而被他的接替者以不同学术风格的技术援助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避免或消减。这,或许是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一大幸事,也是历史的机缘所在。

衷心感谢董鉴泓先生阅读本文初稿后提出的重要修改意见,感谢李文墨博士提供的苏联专家穆欣在本国的背景资料以及与笔者的讨论和帮助!

注释

- ① 引自陶宗震手稿“对贾震同志负责城建工作创始阶段的回忆”(1995年1月26日),吕林提供。陶宗震(1928.08.18—2015.01.07),1951年1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营建系,1952年7月调入建筑工程部(筹建中)工作,是与苏联专家穆欣一起工作时间较长的规划技术人员。
- ② 严格讲,当时在华与城市规划工作有关的苏联专家还有受聘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的建筑专家土曼斯卡娅(女),但她并非正式聘请,而是随她的丈夫到华工作,其对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影响,尚不能与穆欣相提并论。
- ③ 同①。
- ④ 陶宗震2012年3月30日口述,根据吕林提供的录音磁带整理。
- ⑤ 网址为“<https://dic.academic.ru/dic.nsf/rwwiki/1194953#.D0.9C>”。刘伦希提供。刘伦希,201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哈尔滨俄籍建筑师研究》(导师:刘大平),目前在大庆石化工程有限公司工作。
- ⑥ 同济大学博士(2019年9月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导师:张松)。
- ⑦ 文中指出:“我在两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接触过若干位苏联专家,其中两位曾给我以深刻的影响。一位是都市计划专家穆欣同志,他曾经随同苏联都市计划权威、建筑科学院舒舍夫院士共同工作过多年,有丰富的智识和经验。另一位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阿谢普可夫教授——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们来到中国的时间虽然不久,但对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建筑已有了很大的贡献。”见参考文献[19]。
- ⑧ 网址: <http://tramvaiuskustv.ru/grafika/sp-isok-khudozhnikov/item/3408-mukhin-aleksandr-sergeevich-1900-1982.html?nsukey=g24leIlpSCSaimZfbaJPKYOFK-ZJJAKxjAsufxRjoBzipIDk7C6fX%2F6g-WThIj%2BsFAIYHbF9ljVTE%2BwPs8-Kq%2Bau%2BTwp5F3XlQXvENNok-GD7lc%2FS1460JBwF2vtueiL%2FSmvo-Wwm23%2BJ%2BllwQiFsXUO%2F%2F78mr8OL%2F9hOTkLgeIN6ciwzKO-O7ETzTFkReD1hfKueHsQazLu1KLdtj-404nDw%3D%3D>
- ⑨ 网址: http://lexicon.dobrohot.org/index.php/ГЛАВНЫЙ_АРХИТЕКТОР_ГОРОДА
- ⑩ 董鉴泓先生2017年4月15日与笔者的谈话,以及阅读本文初稿后于2019年10月22日向笔者反馈的评阅意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北京都委会.北京市都委会1952年工作总结[R]//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档案.北京

市档案馆,档号:150-001-00056.1953:14.(BeijingMunicipalCommittee.Worksummary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in 1952[R]//Archives of Beijing Municipal Planning Commission. Beijing Archives, File No.: 150-001-00056.1953:14.)

- [2] 北京都委会.都市计划座谈会会议记录[C].北京市档案馆,档号:150-001-00003.1952:29-34.(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Minutes of symposium on urban planning[C]. Beijing Archives, File No.: 150-001-00003.1952:29-34.)
- [3] 柴锡贤.柴锡贤先生谈话[M]//李浩.城·事·人——城市规划前辈访谈录(第五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CHAI Xixian. Talk with Mr. Chai Xixian[M]//LI Hao. City, affairs and people——interview with senior urban planning (Part 5).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17.)
- [4] 城建局.苏联专家在鞍山市城市规划工作汇报会上的发言[R]//建筑工程部档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图书馆,档号:L沪128.1952:7-14.(Urban Construction Bureau. Speech of soviet experts at Anshan urban planning work report meeting[R]//Archives of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Library of China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File No.: L沪128.1952:7-14.)
- [5] F·B·尤埃尔.上海市旧租界地形图[R]//城市建设部档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案卷号:0006.1855.(YOUELFB. Topographic map of Shanghai old concession[R]//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Office of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File No.: 0006.1855.)
- [6] 方玄初,等.谈城市建设中的“文教区”[N].人民日报,1957-01-11(2).(FANG Xuan-chu, et al. O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reas" in urban construction[N]. People's Daily, 1957-01-11(2).)
- [7] 杭州市建设局.杭州市初步规划示意图[R].杭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档号:18223.1953.(Hangzhou Construction Bureau. Schematic diagram of Hangzhou preliminary planning [R]. Hangzhou Urban Construction Archives, File No.: 18223.1953.)
- [8] 华北财委城建处.关于包头市城市建设的问题[R]//包头市财委档案,包头市档案馆,1953.(Urban Construction Office of North China Finance Committee. Problems on urban construction of Baotou city[R]//Baotou Finance Committee Archives, Baotou Archives, 1953.)
- [9] 会议秘书处.彭真同志主持的各大城市市委负责同志座谈城市工作问题的简报及参考材料[R]//中共北京市委档案,北京市档案馆,档号:001-009-00258.1953:39.(Conference Secretariat. Briefing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discussion on urban work issues by leading comrades of municipal committees in major cities chaired by comrade Peng Zhen[R]//Archives of Beij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Archives, File No.: 001-009-00258.1953:39.)
- [10] 建筑工程部城市设计院资料室.城市规划

- 参考图例[R].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案卷号: 2354. 1958. (Reference Room of Urban Design Institute of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Urban planning reference legend[R]. Archives of China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File No.: 2354. 1958.)
- [11] 建筑工程部党组. 第一次全国建筑工程会议总结报告[R]//建筑工程部档案, 中央档案馆, 档号: 255-1-1-4. 1952. (Party group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epartment. Summary report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ference[R]//Archive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Department, Central Archives, File No.: 255-1-1-4. 1952.)
- [12] 李浩.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M]. 第二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c. (LI Hao. The planning of eight key new industrial cities: urban planning history of P. R. China in 1950s[M]. 2nd Editio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9c.)
- [13] 李浩. 来华技术援助城市规划的四批苏联专家(1949—1960年)[J]. 北京规划建设, 2019a(1): 168—171. (LI Hao. Four groups of Soviet experts who came to China for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urban planning (1949—1960) [J]. Beij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2019a(1): 168—171.)
- [14] 李浩. 苏联专家对“一五”时期太原市规划编制工作的技术援助[J]. 北京规划建设, 2016(1): 159—163. (LI Hao. Technical assistance of Soviet experts to the planning work of Taiyuan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 Plan period[J]. Beij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2016(1): 159—163.)
- [15] 李浩. 苏联专家穆欣与新中国首次城市建设座谈会(上)[J]. 北京规划建设, 2018a(3): 163—165. (LI Hao, Soviet expert Мухин and the first symposium on urban construction in new China (I)[J]. Beij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2018a(3): 163—165.)
- [16] 李浩. 苏联专家穆欣与新中国首次城市建设座谈会(下)[J]. 北京规划建设, 2018b(4): 161—163. (LI Hao, Soviet expert Мухин and the first symposium on urban construction in new China(2)[J]. Beij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2018b(4): 161—163.)
- [17] 李浩. 中国规划机构70年演变——兼论国家空间规划体系[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b. (LI Hao. 70 year evolution of China's plann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9b.)
- [18] 李浩. 周千峙院士谈“三年不搞城市规划”[J]. 北京规划建设, 2015(2): 166—171. (LI Hao. Academician Zhou Ganshi, on "three years of urban planning without urban planning"[J]. Beij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2015(2): 166—171.)
- [19] 梁思成. 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思想[N]. 人民日报, 1952-12-22(3). (LIANG Sicheng. Soviet experts helped us to correct the thinking of architectural design[N]. People's Daily, 1952-12-22(3).)
- [20] 刘敦桢. 刘敦桢全集: 第十卷[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LIU Dunzhen. Complete works of Liu Dunzhen: volume 10[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7.)
- [21] 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 穆欣同志关于上海市城市规划的报告[R].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档号: 102-2-26. 1953. (Shanghai Municipal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Report on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by Мухин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nstruction committee[R]. Archives Office of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File No.: 102-2-26. 1953.)
- [22] 上海市政建设委员会. 上海市总图规划示意图[R].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案卷号: 0007. 1953. (Shanghai Municipal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Schematic diagram of Shanghai general plan[R]. Archives Office of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File No.: 0007. 1953.)
- [23] 孙敬文, 贾震. 城市建设局两个月工作的基本总结[R]//建筑工程部档案, 中央档案馆, 档号: 255-2-93-1. 1953. (SUN Jingwen, JIA Zhen. Basic summary of two months' work of urban construction bureau[R]//Archives of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entral Archives, File No.: 255-2-93-1. 1953.)
- [24] 陶宗震. “饮水思源”——我的老师侯仁之[R]. 陶宗震手稿, 2008-05-29: 6-7. (TAO Zongzhen. My teacher Hou Renzhi[R]. Manuscript of Tao Zongzhen, 2008-05-29: 6-7.)
- [25] 万里. 关于上海市的城市建设问题——1956年6月30日在上海文化俱乐部的报告[R].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 案卷号: 0001. 1956: 58—59. (WAN Li. O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 report on Shanghai culture club on June 30, 1956[R]. Archives Office of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File No.: 0001. 1956: 58—59.)
- [26] 万列风. 万列风先生访谈[M]//李浩. 城·事·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第一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WAN Liefeng. Interview with Mr. Wan Liefeng[M] // LI Hao. Interview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urban planners in new China (Part I).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17.)
- [27] 杨永生. 建筑百家回忆录[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YANG Yongsheng. Memoirs of hundreds of architects[M].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00.)
- [28] 张松, 李文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苏联影响”[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5): 85—91. (ZHANG Song, LI Wenmo. The Soviet Union's influence on urba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system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9 (5): 85—91.)
- [29] 赵晨, 申明锐, 张京祥. “苏联规划”在中国: 历史回溯与启示[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2): 107—116. (ZHAO Chen, SHEN Mingrui, ZHANG Jingxiang. The Soviet Union—style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retrospection and implication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2): 107—116.)
- [30] 赵瑾. 赵瑾先生访谈[M]//李浩. 城·事·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第二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ZHAO Jin. Interview with Zhao Jin [M] // LI Hao. City, affairs and people: interview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urban planners in new China (Part II).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17.)
- [31] 中财委. 城市规划设计程序(初稿)[R]. 天津市档案馆, 档号: X0154-C-000131. 1952: 22—29. (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 Commissio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rocedure (1st draft) [R]. Tianjin Archives, File No.: x0154-c-000131. 1952: 22—29.)

修回: 2019-12